

## 墨子里籍辨析

李红昌

墨子姓墨名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其生活年代，正处于我国社会大变革、各种思想异常活跃、因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之交，“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其思想主张中的尚同、兼爱、节用、非攻等观点，因代表了中下层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受到了普通大众的认可和欢迎，成为战国和秦汉之际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代显学。

至西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学渐趋衰微，其经典著作《墨子》一书也未能完整流传下来，只残存大半，其传人也销声匿迹。至使墨子里籍等问题成为 2000 多年来的一大历史悬案。

关于墨子里籍，历史上曾有四种说法，后经学者、专家多方考证、研究，至今天，其争执的焦点大致集中在“鲁国”与“鲁阳”，亦即今山东曲阜和河南鲁山之争上。

持鲁国说和持鲁阳说的两家，又是依据同一条资料，即东汉学者高诱在为《吕氏春秋》作注时，在《当染》、《慎大》篇中“墨子名翟，鲁人也”的记述。前者认定“鲁人”即“鲁国人”，亦即曲阜人（后来又有滕州人之说）。后者认定“鲁人”是“鲁阳人”。高诱一个“鲁人”，给后代史学家留下了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

最早为墨子找到里籍归属的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曾任翰林院修撰和河南、山东巡抚及湖广总督的毕沅，他在考察了河南、山东两处“鲁”地后，在《墨子注序》中指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楚四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嘉庆朝的著名方志学家，考据家武亿也指出：“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盖墨子居于鲁阳，疑尝为文子之臣。”（《跋墨子》）

据此，墨子里籍应是明明白白无有疑义的。然而，清末光绪朝学者孙诒让，以《墨子》中的片言只语，认定墨子是鲁国人，从而挑起了鲁阳说和鲁国说的争端。

然而，历史毕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有迹可寻、有案可查的痕迹。只要我们仔细拂去附着在历史事实上的尘埃，有关墨子里籍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的。

## 一、鲁阳之“鲁”早于曲阜之“鲁”。从东西鲁的关系看墨子里籍归属

据史料记载和专家考证，早在公元前 20 世纪至前 17 世纪的夏朝对，鲁山地区就称作“鲁”。《逸周书》中有“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的记载。春秋前称鲁县，战国时称鲁阳。而直到商代，曲阜地区还称作“奄”。

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灭商后，曾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分封，将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分封于鲁山地区，称作鲁侯。

因周公不能离开周都，由周公的儿子伯禽代父做了鲁侯。。鲁阳故城（今鲁阳镇西 10 公里的邱公城遗址）就是鲁国的国都。武王在灭商后的第二年即死去，成王即位，成王的几个叔叔勾结商朝后裔——纣王的儿子，在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商丘、曲阜一带）发动叛乱，周公亲率周军东征，成王也“践奄”，鼓励士气，终于平定了叛乱。为表彰周公的赫赫战功，成王“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左传》）。这时鲁国的国都，才由鲁阳而迁于曲阜，曲阜一带才由奄改称作鲁。历史上把鲁阳之鲁称作西鲁，把曲阜之鲁称作东鲁，东鲁实际上是西鲁的继承和延续。在《墨子》成书的时代，东鲁和西鲁实际上是很容易区别的。

弄清了东鲁和西鲁的关系，孙诒让以“墨子自鲁即齐”、“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郢”等为依据，而断定“鲁”即指鲁国，就是显得苍白无力了。以此为据，倒是“鲁”即指鲁阳之说更令人信服了。在这方面，专家已多有论证，笔者不再赘述。

## 二、从《墨子》一书中的方言土语，看墨子的里籍归属

墨子提出了节用、节俭、非乐的口号，墨子主张尚质，反对尚文。这一思想和观点不但是墨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在墨家经典著作《墨子》一书中的章法结构、行文方式、语言特点方面，也带有明显的烙印和痕迹，使得《墨

子》一书在先秦哲理散文中，以质朴无华著称。墨家学派在所著书立说中，采用的是当时的口语，甚至是某一地区的方言，而不是儒家经典中那种经过修饰的“文言”或“雅言”，这在当时使他们的文章有一种平易近人，娓娓道来的风格特色。虽然给后人阅读和理解《墨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障碍，但是，却给我们研究和考辨墨子里籍，带来了弥足珍贵的依据和凭证。

我们知道，由于区域文化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人们，在语言的表述、使用习惯上会存在一些差异和区别，尤其是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方言土语，虽经千百年历史沧桑，仍被后人继承和沿用，应该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活化石。在《墨子》一书中，那些令史学大家费尽脑筋，难以注释清楚的冷僻词语，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角度，从鲁山及其周围地区的方言来理解，可谓是“柳暗花明”了。

在这方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萧鲁阳同志，鲁山县史志办的郭成智同志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按照萧、郭二先生的思路，笔者仔细地研读了《墨子》一书，也发现了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方言土语，现不揣愚陋冒昧，试解于后，以求教于诸位老师和同仁。

### (1) “小”

在《墨子·杂守》篇中有“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一段话。在这里睨通倪，意为小孩未成年人，“小”作不足、

低于解。“小五尺”就是不足五尺。这句话的完整意义是：那些小孩或身高不足五尺以上，不可以服兵役的人。其实“小”作不足解，在鲁山及周围地区尚有多种用法，如年龄接近五十又不足五十的人称为“小五十”，接近三十不足三十的人称为“小三十”等等。

## (2) “窑”、“灶”

《备穴》中有“斩艾与柴长尺，乃置窑灶中，先垒窑壁”。后面有“穴二窑”、“为窑，容三园艾者”等句子。在这里，第一句中“窑灶”当为重叠用法，作“灶”解，后面三处用“窑”也应做“灶”解。在《汉语辞典》中“窑”有四种意义：①烧制砖瓦、陶瓷等物的建筑物，如砖窑、石灰窑等。②土法生产的煤矿，如煤窑。③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就土山的山崖挖成的洞。④妓院。“灶”有两种意义：①用砖坯、金属等制成的生火做饭的设施。②指厨房。

在《备穴》中，“窑”、“灶”都指的是泥砌或挖成的用于点燃柴草、艾枝等用来熏烤敌人的建筑，其形状和使用上更接近于灶。在《备蛾傅》中有“五尺一灶，灶门有炉炭”，《号令》中有“诸灶必为屏，火突高出屋四尺”，《杂守》中有“聋灶”等句子、词语。这里“灶”的用处，要么用于熏烤敌人要么是升烽火以报警。

仔细究来，《墨子》一书中，似有窑、灶不分，混用的特点，这和鲁山及周围地区的口语也很吻合。在该地区，人

们把用砖、坯、泥巴垒砌而成的灶，叫锅台，把用来燃烧柴草、煤的炉膛叫“锅底窑儿”，如人们常说，“锅底窑儿垒得太大了”，“在锅底窑儿里埋一块红薯，一会就烧熟了”。同时，把挖成的不大的洞穴，也叫“窑儿”，如“菜窑儿”、“柿子窑儿”。甚至小孩子玩弹珠、砸杏核等游戏，在地面上挖的一个小坑，也叫做“窑儿”，进窑儿为胜者，进不去为输家。小一点的洞叫窑儿，大一点的洞叫窖，这和《墨子》中“窑”、“灶”的用法是很接近的。直至今天，在农村还有这种用法。

另外，关于“聋灶”，一些学者解释为“灶”，一些学者解释为“垄灶”。垄是耕地上培成的一行行稍高的土埂。垄灶作何解，似无确切含义。其实，只要考察一下当今的偏远山区还在使用的灶台结构就可明白其含义了。

在农家，农民为了充分利用柴草或煤燃烧的能量，往往在主灶的后面或侧面再垒一个次灶，两灶相连，内有火道使两灶膛相通。这样，主灶的火苗可以窜至次灶内，在次灶上可以炒菜、烧开水，以充分利用燃料能量。有时在主灶的两侧同时连两个次灶，就像两只耳朵长在主灶上一样。

《墨子》中所指的灶窑，都是用来点燃烽火或薰烤敌人的，只有一个主灶也就可以了。所以说，“聋灶”只是一个独立，没有分灶的灶台。对于这一点，如果不研究鲁山及其周围地区的风土民情，即使皓首穷经地考证、辨析，恐怕也

难以弄出个所以然来。

### (3) “阴暴”

《非攻》（下）中有“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有学者释“阴”为“隆”字之误，“暴”者“爆”之假借字。实际上“阴暴”一词，在鲁山及其周围地区，是一个使用很广泛的方言，也很容易为大众理解。阴为暗中、偷偷地不被人发现，暴有糟蹋、欺凌、损害、毁灭等含义。“阴暴”即暗中给人以伤害、损害、破坏。在俗语中，有“你阴暴人”、“我被人阴暴了”等说法。

当然，在《墨子》一书中，还有一些鲁山周围地区的方言土语，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墨子作为鲁山人的一个有力之佐证。

综上所述，墨子和鲁山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山的风土人情，民风习俗对墨子的感染熏陶，是很深厚的。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个结论，即墨子是鲁山人，墨子是在鲁山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墨子的整个一生乃至其思想、其作品，都带有鲁山社会文化环境所留下的深深烙印。